

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年： 历史、困境与前景

——对南非宪法之父奥比·萨克斯的访谈^{*}

奥比·萨克斯 朱鹏飞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南非宪法法院首任大法官、被誉为南非“宪法之父”的奥比·萨克斯的深度访谈，从制度设计者和亲历者的独特视角，全景式地回顾和分析南非民主转型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困境。访谈内容涵盖萨克斯的革命经历、1990—1994年关键转型时期的制宪过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作用与局限，以及当下南非面临的国家俘获、社会失范、族群冲突、原住民权利等核心问题。萨克斯对南非民主转型给出差异化评价：政治转型110分，权利保障80—90分，但生活质量提升仅30—40分，深刻揭示了政治转型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珍贵的口述史资料，本访谈不仅为南非研究提供了少见的“内部人”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也为理解转型政治、后殖民社会治理等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素材，对其他转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南非民主转型 转型正义 国家俘获 族群政治

作者简介 奥比·萨克斯，南非宪法法院首任大法官，被誉为南非“宪法之父”；朱鹏飞，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讲师（北京100048）。

历史回顾：革命、转型与新宪法的诞生

导语：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也译为奥比·萨克思），1935年出生于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号：留金选[2021]70）阶段性成果；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委托项目“金砖国家的文明区划与交流互鉴研究”（项目号：20240304）的阶段性成果。

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犹太裔移民家庭。1951 年进入开普敦大学攻读法律学士学位，次年开始投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革命活动，成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学生时代的萨克斯深受中国革命影响，信仰共产主义，曾于 1954 年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和勉励。21 岁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开始执业，经常为种族隔离政策下因违反种族歧视性或国家安全相关法令而被控告的人进行辩护，为此屡次被捕入狱。

1966 年，萨克斯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开始流亡生活。流亡英国期间，在苏塞克斯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1977 年移居莫桑比克，协助这个新近独立的国家建立法制，并经常前往临近的赞比亚协助流亡到当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以下简称“非国大”）及其主席奥利弗·塔博（Oliver Tambo），为当时仍是流亡革命组织的非国大起草行为准则和章程等法律文件。1988 年 4 月，南非白人政府特务在莫桑比克实施汽车炸弹暗杀，萨克斯虽然幸存，却失去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的视力。遇袭前，他已受塔博委托，为即将到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宪法人权宪章。

1990 年，南非迎来和平民主转型，非国大不再被视为反叛组织，曼德拉获释出狱，萨克斯得以回到阔别 24 年的祖国，被曼德拉委任加入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1994 年，曼德拉当选新南非首任总统，萨克斯倾注心血的新宪法获得通过，同年他获曼德拉提名，成为新南非宪法法院首任大法官。

（一）青年时代：革命与信念

笔者：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作为开始，我想请您从“信念”和“精神”两个维度谈谈您的传奇人生。您与曼德拉、德斯蒙德·图图一样，都是南非传奇人物，你们的名字已成为南非的符号和象征。您能否结合成长经历分享一下是如何成为传奇的？是什么信念促使您决定成为自由斗士？这种信念源自何处？成为传奇之后，您的名字在南非代表着怎样的精神？

奥比：这个过程充满矛盾。我 17 岁时成为政治活动家，当时还是开普敦大学法学院二年级学生，从那时起开始参与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中国革命影响，1949 年新中国成立是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在这个抗争过程中存在一个最大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理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而非个人英雄”，但在苏联，由于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拜而动摇这一理论。而我始终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非某些个体。”

对于“传奇”这一称号，我既感到欣喜和感谢，又感到惶恐，因为这种矛盾如今正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进一步解释。去年，阿玛尔和乔治·克龙尼（Amal and George Clooney）以我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关于正义的奖项，名

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年：历史、困境与前景

为“奥比奖”（The Albies）。当我接受这个奖项时，内心非常矛盾。我一生致力于打破传统旧习，反对偶像崇拜。但是，我努力打破偶像符号的结果却使自己成为新的偶像符号。这类似于宗教史上的“毁坏圣像运动”^①，世俗权力在摧毁圣像的过程中往往催生出新的偶像崇拜和对偶像的神圣化。

这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奖项是由米歇尔·奥巴马在纽约为我颁发的。领奖的时候我说，很多人的名字都可以用来为这个奖项命名，比如曼德拉、塔博、布拉姆·费舍尔（Bram Fischer）^②等。为什么选择我呢，也许是因为我还活着，人们可以看见我身上的伤痕，将我视为有价值的象征。对此我既有欣喜也有不悦。

笔者：您刚才提到青年时期深受中国革命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促使您决定成为自由斗士？在成为自由斗士之前，您还有其他身份，比如律师，以及犹太人家庭出身。这些因素是否对您产生影响？

奥比：我的父母都是南非共产党党员。父亲曾是工会领袖，因反对右翼空想主义遭到驱逐。母亲是共产党期刊部门的打字员，为争取黑人权利工作。我从小在反种族主义家庭中成长，但我并不认为投身革命是受父母影响，这主要是我的个人决定，在读大学时遇到一群革命青年才决定加入他们。中国革命非常伟大且极具启发性，我在1954年访问过中国。

笔者：我了解到您那次访问中国时与周恩来总理见过面，那是怎样的体验？能否分享当时的经历？

奥比：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中国的那段经历很美好，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在形成的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同两国领导人协商逐渐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重要准则。我对中国的那次访问很美好，深受启发。

后来，中苏之间爆发冲突。这对当时的南非没有很大影响，我们与中苏两国的距离都很遥远，并且当时仍面临着自身独特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任务。我们得到

^① 毁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是公元八、九世纪拜占庭教、世俗统治集团发动的禁止使用和崇拜圣像的社会斗争。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运动以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于726年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843年幼帝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摄政皇后提奥多拉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持续了117年。相关文献参见：陈志强：《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51—59页；龚伟英：《破坏圣像运动与八九世纪的东西方政教关系》，《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31—49页。

^② 布拉姆·费舍尔，1908年出生在南非自由州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庭，祖父曾是南非奥兰治殖民地总理，父亲是奥兰治自由邦首席法官。布拉姆后来走上律师之路，经常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革命人士进行辩护。布拉姆也是南非共产党领袖，曼德拉的好友和法律顾问，在1956—1961年叛国审判（Treason Trial）和1963—1964年的里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中，多次为曼德拉和其他革命人士进行法律辩护。1966年，布拉姆因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后在狱中身患癌症，于1975年出狱两周后离世。

中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很多支持。

我们还得到瑞典、挪威以及西方进步运动的支持，同时获得很多来自古巴的支持，其次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但我们最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念，即一种拥抱多党民主的革命。我们的《自由宪章》^① 包含了很多政党，我们这代人对随后诞生的宪法感到非常骄傲，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竞争性选举、政府轮换、言论自由和公开辩论，这些都是与我们国家今天需求最相符的。

笔者：如您所说，您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且成为一名自由斗士，为南非人民的自由而奋斗。

奥比：是的，我曾经是南非共产党地下党员，后来从监狱出来，我不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开始流亡海外。我没有与南非共产党再建立联系，但这并非我从哲学理念上对它产生抗拒，而是因为我自身不够强大，没有能力再作为革命者继续从事这份工作。

我很喜欢“百花齐放”这个概念，1954 年我在中国时，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很包容、很开放。我们在中国遇到的年轻人能讲英语、德语和法语，这些翻译人员受教育程度很高，他们既爱国又热情。后来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当我再次回到北京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令人震撼，北京完全像变了个城市。^②

（二）转型岁月：制宪过程与“秘密会议”

笔者：接下来的问题关于南非民主转型。我们谈论南非民主转型时都会想到 1994 年。但开普敦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关于南非民主转型，我们更应该关注 1990—1994 年这段时期。因为 1994 年之后推出的所有政策和决定都源于这段时期，1994 年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这段时期各方博弈的结果。”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当时的经历？那段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这对理解南非民主转型至关重要。

奥比：是的。当时非国大及解放斗争的策略是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创立新的宪政秩序，以便为政治转型开辟道路。我猜测那位教授认为我们所做的决策是为了阻碍转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就在那里，是亲身参与者。对于土地问

^① 《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是 1955 年 6 月 26 日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南非印度人大会（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南非有色人大会（Coloured People's Congress）和南非民主党人大会（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Democrats）等党派团体在南非柯利普城（Kliptown）召开的南非人民大会上通过的一项重要文件。它确立了跨越种族界限、实行全民民主的革命奋斗目标，并提出掌权后推行国有化和土地再分配等原则，后成为 1996 年南非宪法的基石。

^② 奥比·萨克斯曾于 2013 年受邀到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座，这是他自 1954 年后第二次访问北京。

题、经济问题、权利问题，我们始终带着解放的愿景去考虑。

制定宪法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起草宪法创建新议会；第二阶段是起草宪法，一直持续到 1996 年。起草成员们都非常积极地寻求变革，想要重构和改变。新宪法赋予工人运动权利和妇女运动权利，具有很强的解放性。所以，1990—1994 年期间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开创变革。我们没有将它引导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当时的主客观环境和世界形势都不允许，但重大转型和变革是允许的。

1994 年，我从政坛退出并成为大法官。我知道 1990—1994 年那段时期的策略，当时的策略就是要创立一部宪法，使其能够保障重大转型和变革。你可以查看宪法文本，宪法文本显示我们赢得了那场博弈。

笔者：我还有一个疑问。我知道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在革命之初有很多共同目标，比如承诺在取得政权后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对国家关键经济部门进行国有化改革等。但 1994 年非国大掌权后，很多基本制度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非国大领导的新南非反而很快拥抱了新自由主义，这似乎背离了他们最初奋斗的目标。

奥比：这种变化的时间点不是 1994 年，而是 1996 年。最终版宪法是在 1996 年完成的。如果你看宪法，它根本不是一部新自由主义宪法。你可以指出宪法中任何一条关于社会和经济权利的规定，它们都不是新自由主义的。

非国大执政之初奉行的是重构式发展道路，关于当时推行的具体经济政策可以参考《重建与发展计划》^①。但这一政策在 1996 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它是从重构式发展转变为促进经济增长前提下的发展与重构。实际上这里发生了一个路径转换，即从重构与发展转向鼓励投资，尤其是国外直接投资。政策导向转为鼓励国外直接投资，一些外资被吸引进来。尽管如此，如果你看之后的项目甚至今天的项目，它们都不是新自由主义的。

举一些例子，比如使 1/3 的人口获得社会福利，这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增加。比如免费教育，虽然教育质量不够好，但它为学生提供的支持实现了很大增长，以及整个社会服务体系中对母亲和儿童的免费照顾。我

^① 《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是非国大在多党谈判达成协议、南非即将举行第一次全民选举前公布的竞选纲领以及新政府成立后的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南非种族和解政策的实际，《重建与发展计划》删去了《自由宪章》中有关国有化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原则。后又由于《重建与发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迟迟难以兑现，1996 年时任副总统姆贝基提出《全国增长与发展战略》，随后曼德拉总统宣布关闭重建与发展办公室，具体事务由有关各部负责。参见：葛信：《从〈自由宪章〉到〈重建与发展计划〉》，《西亚非洲》1996 年第 5 期，第 1—6 页。

们已经把 300 万套住房免费分配给穷人，相当于为全国 1/4 的人口提供了保障性住房。这些都不是新自由主义，我称它是一种混合型的，是社会民主混合了新自由主义，而非简单的新自由主义。

笔者：您作为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南非宪法法院首任大法官，并且被尊称为宪法之父，能否介绍一下南非法律体系的相关知识，谈一谈新宪法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

奥比：我有两本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你对此熟悉吗？一本是《温柔的复仇》^①，另一本是《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②，你可以找到这两本书来读。我现在送给你另一本书，这是纪念奥利弗·塔博诞辰 100 周年时我作的 4 场讲座。^③其中一个讲座是关于把宪法作为 1990—1994 年间斗争框架的问题，另一场是关于财产权条款和土地改革的。这些内容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你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关于宪法、社会和经济的很多内容。

笔者：1990—1994 年那段时期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所谓的“秘密会议”。据说当时的参与者包括非国大和国民党（National Party）的高层人物以及南非一些重要的财阀集团和豪门家族。

奥比：那些都是被发明创造出来的。整个宪法制定过程非常紧张，非常漫长，耗时 4 年。我们在 1994 年推出临时宪法，最终版宪法是在 1996 年完成的。我听说过关于曼德拉与阿非利卡富商之间召开秘密会议的传闻，这些都是“垃圾”。如果它发生了，也许它发生了，但它并没有波及我们，而且完全没有影响我们。真正发生的是什么？我们面临第一个黑人政府即将在南非建立的困境。种族主义视野下的黑人政府往往意味着失败、崩溃、无能与腐败。第一个黑人政府在职能上要保证人们继续工作，经济不至于崩溃，这是非常重要的。

首个黑人政府面临的压力是要处理两个完全矛盾的问题。第一是保持平衡，让社会运转——确保工厂开工、农场生产食物、商店正常运营，最大可能地保持社会稳定。第二是白人掌控着一切，这非常具有毁灭性。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张力非常难以处理。塔博·姆贝基担任总统时非常努力地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他认为解决方案应该是用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这种政策在最初几年似乎很奏效，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经济运转良好，政府在减轻贫困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后来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以矿产资源为主的经济繁荣景象开始衰退，证明

① [南非] 奥比·萨克斯：《温柔的复仇：奥比·萨克斯的创痛与重生札记》，尧嘉宁译，麦田出版社 2015 年版。

② [南非] 奥比·萨克斯：《断壁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陈毓奇、陈礼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③ Albie Sachs, *Oliver Tambo's Dream: Four Lectures by Albie Sachs*, African Lives, 2017.

姆贝基的经济政策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危机在祖马总统领导下又因腐败而加剧。这些话不是我说的，宗多委员会^①对此已经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这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而且不仅仅是腐败，还有道德的毁灭，对机会主义的鼓励，对理想主义的毁灭，对希望的毁灭。

(三) 如何评价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笔者：南非民主转型在最初阶段取得很多成就。比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②，它开创了转型正义的新典范，被称为“修复型转型正义”。但我观察到它目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批评和挑战。比如科伊桑人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时的工作主要是针对黑人和白人这些主体族群，而他们作为边缘族群却被遗忘了。您如何评价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奥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非常庞大，而且非常重要。当时正是南非的重大转型时刻。人们拥有了投票权，他们可以看到改变。但是委员会本身并不是包揽一切的，人们强加于它的期望太多。委员会承担的任务是很狭窄的，它并不承担修建住房、创造就业和创造机会等任务。但它在解决人们的痛苦方面是非常有力的，它使得痛苦得以释放，人们遭受的痛苦得到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人们对委员会的失败感到愤怒，但这并不是委员会的过错，而是政府在此之后的失职。

我认为委员会在揭露残忍和暴力方面非常有效，它对于鼓励人们站出来说明自己曾经所作所为的事实真相非常有效。它最大的缺陷在于赔偿，这不只是钱的问题，钱太少了，赔偿并不慷慨。他们本应致力于社会修复、社区参与、商业参与和邻里参与，但很不幸他们并没有做这些深层改变的工作。它非常真实，这源于它的程序公开性，源于发言者证词的质量。它是现象级的存在，调查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它提供的情感价值非常重大。

^① 宗多委员会（Zondo Commission）于2018年1月成立，旨在调查前总统祖马时期南非公共部门关于国家俘获、腐败和欺诈指控司法调查委员会。其全称是“调查国家俘获指控司法委员会”（The Judi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Allegations of State Capture），运行起止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至2022年6月15日，宪法法院首席大法官雷蒙德·宗多担任委员会主席，因此也被称为“宗多委员会”或“国家俘获委员会”（State Capture Commission）。

^②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是南非实现民主转型后，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而成立的官方机构，专门对1960—1994年种族隔离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并组织听证会和进行后期赔偿。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根据1995年第34号《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于当年11月29日成立，由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担任委员会主席。听证会从1996年4月一直持续到1998年6月，并于1998年出版五大巨册的长篇报告。

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它并没有解决南非的现实问题。它是处理过往创伤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很尖锐，也很痛苦，它无比真实，而且在那个时候也非常重要。但这并不能弥补现实，因为现实中有如此多的不平等，我们永远不可能实现完全和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要单纯依靠委员会实现和解是不可能的。

当下困境：国家俘获、社会失范和边缘群体

导语：1994 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新南非在国家重建与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贫穷、失业、治安、腐败等问题是长期困扰南非的几大顽疾。这部分访谈主要围绕笔者在南非调研期间关注的国家俘获、社会失范和边缘人群的权利诉求等议题展开。国家俘获主要以祖马时期的古普塔家族为案例，^① 宗多委员会是专为解决该问题而成立的司法调查机构；社会失范主要以开普敦地区的有色人黑帮现象为案例；对边缘群体的考察主要涉及开普敦的科伊桑人、底层贫民和外国难民，其中对科伊桑人的考察是与亚马逊事件结合在一起的。

贫穷与失业是困扰南非的第一大难题。新冠疫情期间，贫穷与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底层贫民沦为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南非统计局 2021 年公布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南非全国失业率高达 32.6%。^② 开普敦市政府 2013 年颁布的街头流浪人员政策显示，2010 年开普敦约有 7000 名流浪者，全南非的街头流浪者数量则为 10 万—20 万人。^③ 意大利学者阿尔伯托·卡奥奇 (Alberto Caoci) 博士对开普敦流浪者进行的统计调查显示，2020 年开普敦大约有 14000 名流浪者，其中大约 800 名流浪者生活在开普敦的中心城区，许多流浪者在街头生活已长达 20 年以上，他们大部分人沦落街头的原因都与毒品、艾滋病有关。^④

(一) 国家俘获：从愤怒中看到希望

笔者：这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俘获。我认为国家俘获是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年来

- ① 朱鹏飞、杨崇圣：《资本权力与族群政治：南非国家俘获的形成逻辑——以祖马时期的古普塔家族为案例研究》，《区域国别学》2022 年第 1 期，第 29—56 页。
- ②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Quarterly Labour Force Survey – Quarter 1:2021,” June 1, 2021, p. 13.
- ③ City of Cape Town, *Street People Policy* (Policy Number 12398B), September, 2013, p. 5.
- ④ UCT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Cape Town – Living on the Street*, February 20, 2023, <https://m.youtube.com/watch?v=jGqVnwdejJ8>,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4.

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年：历史、困境与前景

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为什么会在南非发生？您如何看待南非的国家俘获，以及如何评价宗多委员会对此展开的工作？

奥比：宗多委员会报告公布的时候，我有两种极其混合又对立的感受。首先是震惊、愤怒与痛心，报告公布出来的数据和事件令人发指。其次，我对国家俘获这一案件得以被调查和公布又感到欣慰和高兴，因为它恰恰证明了南非是一个宪政国家，面对政府滥用权力，我们可以通过宪法机制对其进行约束和纠正，然后使国家回归正轨。从这个事件中，我看到南非已经拥有一个力量足够强大的社会，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媒体和记者，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有很多经历过以前艰难岁月的正义人士，他们始终坚守着社会的尊严与良知。

南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南非这样，政府为自己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自己的罪行；不是现任政府对前任政府进行调查，也不是一个政党对另一个政党进行调查，而且即便是总统，面对指控也要接受调查。我们的总统花了两天时间接受委员会对总统职责的检验，作为非国大领袖，他走进证人席与政府一起接受质询。我们不惜花巨资、扩大调查范围也要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有效进行。这是积极的一面，也是南非的优势，我们有非常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畅所欲言。

坏的一面是这个事件涉及的并非简单的几桩鸡鸣狗盗，而是严重的丑闻和犯罪，而且仍有很多其他不幸之事在发生。我认为当人民的主体依然极度贫困、没有机会、没有财富积累时，都会发生这种不幸。国家成为一种晋升和致富的工具，这更多是资本主义逻辑导致的，它强调利用一切机会成就个人价值。社会主义总是被谴责应该对所有问题负责，但我认为资本主义应该真正受到谴责。资本主义寻求以最快速度、不择手段地获得更多财富，它制造了一种自私的和个人主义的精神状态。

（二）社会失范：有色人的暴力与犯罪

笔者：这个问题是关于南非的社会问题。社会不平等和暴力犯罪是当下开普敦乃至全南非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我目前正在开普平原^①做一些相关研究，发现开普敦的黑帮暴力绝大部分都和有色人群体密切相关。这是否与南非的民主转型有关，它是不是民主转型带来的一种后果？相比于白人和黑人群体，有色人似

^① 开普平原（Cape Flats）是位于开普敦市区东南部的一个广阔、平坦的低洼区域，南北夹于福尔斯湾（False Bay）和桌湾（Table Bay）之间，土地沙化严重，且经常遭受大风灾害，历史上长期无人居住。种族隔离期间，开普敦市政把绝大多数的黑人和有色人强制驱逐安置在开普平原，致使该地区成为贫穷和暴力等社会问题最集中的区域，也是开普敦时至今日最危险的区域。

乎是在民主转型中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很难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您觉得有色人的这种失范现象是南非转型带来的问题吗？

奥比：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南非的黑帮很久之前就存在了，不幸的是黑帮并没有伴随着转型而消失。这与失业问题相关联，与人们想要过上有成效的积极生活的雄心和愿景有关。但不那么让人沮丧的是，这并不是南非独有的现象。从某些经验来看，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空间隔离使得这些分裂的区域仍在延续。人们虽然获得了投票权，并且获得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但是他们依然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没什么机会。毒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下毒品、枪支、暴力，有很多文学作品是关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似现象的。

笔者：这种现象为什么更多地发生在有色人群体当中？我对有色人做了一些观察和访谈，发现他们相比于白人和黑人似乎对政治并不太感兴趣。比如，科萨人特别擅长使用抗议和发动街头政治来维护和表达他们的权利诉求，有色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特别冷漠。黑帮对于有色人来说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组织形式？您觉得南非政治是否依然受制于族群因素？

奥比：1980 年代的时候，开普平原开始变得非常政治化，那时的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① 在米切尔平原^②成立，它曾经一度非常活跃，很多学生受其影响走上街头搞政治运动。这种情势在民主转型之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势头就越来越弱了。

笔者：据我所知，在非国大成为执政党之前，种族隔离时期的有色人和印度人分别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94 年之后这些政党似乎消失了，它们是不复存在了，还是并入非国大了？

奥比：从历史上来看，非国大是专门为争取黑人权利而成立的。即使在 1955 年《自由宪章》颁布后，非国大仍然只代表黑人的权利。南非印度人大会（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专门代表印度人的权利，有色人大会（Coloured People Congress）代表有色人的权利，民主党人大会（Congress of Democrats）代

^① 联合民主阵线（UDF）是非国大支持的基础广泛的反种族隔离团体，它由 400 多个公共组织组成，包括工会、学生联盟、妇女组织和准教会组织。联合民主阵线成立于 1983 年，以米切尔平原为主要据点，其口号为“联合民主阵线团结，种族隔离分裂”（UDF Unites, Apartheid Divides），其目标是建立一个非种族、统一的南非。当非国大（ANC）、南非共产党（SACP）、泛非大（PAC）和其他组织在 1990 年解禁时，联合民主阵线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于 1991 年宣告解散。

^② 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是开普平原上的一个区域，1970 年代被种族隔离政府划定为有色人居住区，面积约 43 平方公里，人口约 30 万人，是开普敦乃至全南非规模最大的有色人社区。

表白人（左翼）的权利。然后，他们在抵抗运动中、在军事队伍中开始合并。

联合民主阵线实际上属于非国大，但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有色人群体的强烈支持，并且高度政治化，很多人在抗争中牺牲，他们在强烈的非种族基础上为联合民主阵线工作。后来，有色人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保守派动员人们说，黑人不尊重有色人，并且夺走了有色人的权利。同时，一些来自黑人群体的非国大成员是很强烈的非洲主义者，他们主张疏离有色人。事实非常复杂，我想这个主题甚至会走向一个最终议题——原住民。

（三）原住民权利：科伊桑人与亚马逊的冲突案件

笔者：这个问题正是关于南非的原住民。我在开普敦做田野调查的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关于科伊桑人的文化复兴运动，我发现开普敦有很多科伊桑人社会活动家，他们非常活跃。我开始关注科伊桑人是因为亚马逊事件。亚马逊公司在开普敦天文区修建非洲总部大楼引发科伊桑人的抗议，该事件已经持续了大概 5 年时间。亚马逊和科伊桑人之间的冲突很激烈，甚至导致科伊桑人内部分裂。这个案例涉及很多议题，比如土地、环境和发展等问题。通过这个案例，我还发现南非的法律体系存在一些内在冲突和张力，因为南非法律包含罗马—荷兰法、英国普通法和非洲习惯法三个不同法系。比如亚马逊事件这个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开发商和原住民分别依据的是不同法系。法律体系存在的内在冲突为案件增添了新的复杂性。这样的案子在法庭上应该如何判决，法官应该依据哪个法系？

奥比：这个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曝光和谴责不断。这件事对科伊桑人造成的分裂实际上非常让人痛心。当财产和金钱卷入其中，一切都变得复杂，原则性的东西丢失了。人们在那个区域没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联系。亚马逊本身极具争议，人们感受到很多冲突，他们想要发展、想要工作、想要经济增长，这些的确很重要。那块地方并不是一个居住区，而是休闲场所，是一个人际交往之地。它不像一些神圣之地，人们跨越世纪，世代生活在那。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区域对历史文化的重审比其他区域强烈得多。这些因素被卷入这场争议，并引起科伊桑人群体的分裂。一些人宣称亚马逊是在帮助承认科伊桑人的身份，是在保护和清洁这个区域，是在重新创造这个区域。另一些人则说为亚马逊作证的科伊桑人被金钱腐蚀了，他们在撒谎。

笔者：就我所知，反对亚马逊的科伊桑人坚持说那片土地是他们的神圣土

地，是他们的祖先反抗殖民者的战场，即盐河战役（Battle of Salt River）^①发生地。然而，另一阵营的科伊桑人则说那里根本不是盐河战役的准确地点。“践踏历史遗迹”是科伊桑人反对亚马逊的理由，遗产法是他们斗争的主要依据。根据我对一名反对亚马逊的科伊桑人领袖的访谈，他们很早就向西开普省政府申请将该区域列为省级历史遗产。但西开普省政府却回复称该地点值得被确立为国家级文化遗产，导致整个审批过程很缓慢。我估计亚马逊决定在那片区域破土动工时，那里仍未得到任何层级政府的文化遗产审批。

奥比：我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我确实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否已经被确认为文化遗产，也许已经有声明。我想他们（开发商）已经做过环境调查，包括文化遗产方面，还有必要的补偿，这些是他们面临的挑战。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和动机卷入其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说明这些问题很复杂，却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把每一个问题说明白。

笔者：这个事情确实很复杂，尤其是面对法律纷争的时候。当您设计这三个法系同时并存的时候，您是否觉得它们之间存在冲突，是否需要对此进行改进和完善呢？

奥比：诚实地讲，我对亚马逊事件并没有深入参与和了解。我知道他们想把我牵扯进去，但是我不能参与。我甚至没有深入研究这件事，人们对此很失望。我没有表明立场，因为我确实对此事了解不多。我知道在科伊桑人世系的内部存在显著的认同张力。他们的形成是不同的，有些人是基于很强的世系和王室血统凝聚在一起，他们的服饰风格参照和表现这一传统。另一些人的凝聚基础更多的是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他们强调当下获得历史承认的重要性，致力于讲述自身故事和争取现实权利。这些差异不仅仅是科伊桑人的凝聚基础，也是他们成为当下南非仍被压迫群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5 年前我并不知道开普敦有这么多科伊桑人活动家，那个时候如果我看到他们，我会认为他们是有色人。如今他们在活动中明确使用标语：“我们不是有色人，我们是科伊桑人，我们是原住民。”您怎么看待科伊桑人文化复兴运动与有色人群体之间的关系？

奥比：我认识的一些人更倾向于说：“我们是具有科伊桑人血统的那部分有色人。”他们对于科伊桑血统感到自豪，但是他们也许已经混合了其他血统。除

^① 盐河战役（Battle of Salt River）是 1510 年 3 月 1 日由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率领的葡萄牙殖民者与开普科伊科伊人格羚海夸（Goringhaiqua）部落之间爆发的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冲突地点在桌山脚下的盐河入海口附近，即今天开普敦的盐河区和天文区一带。据葡萄牙人当时的记载，双方作战人数均在 170 人左右，战役最终以科伊科伊人的胜利而告终，科伊科伊人用石块和长矛杀死了包括阿尔梅达在内的 65 名葡萄牙人。

了科伊桑人血统以外，可能还混合了穆斯林奴隶或马来西亚奴隶甚至更多源头的血统。他们对王室并不感兴趣，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土地诉求，而是针对所有有色人、欧洲人、边缘化群体和被压迫群体提出关于社会解放和摧毁特殊种族隔离的社会计划。

(四) 本国穷人与外国难民

笔者：我的提问都是关于南非当下的社会问题，希望您不要介意。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贫穷和难民的。我对开普敦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做过一些访谈，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南非人，而很少有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很多穷人甚至说，“行走在某些街区时，反而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外国人。”因为越来越多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来到南非，沿街的小商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经营的，本国人反倒沦为乞丐，沿街乞讨。这不仅让他们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甚至觉得自己在本国沦为难民。所以，街头流浪者和无家可归者大多有很强烈的排外情绪。这是一个让人很心酸的现象，您对此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吗？

奥比：这种现象的确让人很伤心。整个非洲大陆的难民或移民为了谋生而寻找工作，大体上分为两个方向，向北前往欧洲，向南则来到南非。很多人从本国残忍的内战、压迫、屠杀中逃离至此寻求避难。民主南非意识到，我们在种族隔离时期也曾经作为难民在非洲大陆流亡多年；今天我们绝不能把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难民关押在边境的难民营，他们有权利来南非工作。实际上，他们对南非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他们并没有抢走工作。排外往往是被操纵的。我最近刚阅读了一些关于贫民窟里小商店的文章，因为索马里人之间的竞争，他们必须提升各自的服务质量，并且找到降低成本的方式，使自己变得更加高效。这实际上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

我曾经是在莫桑比克的难民，我的生命是被莫桑比克人民和医生拯救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从那次汽车炸弹事件中生还。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非洲国家曾经帮助过我们，今天我们不能拒绝那些来自非洲国家的难民！

(五) 南非是“弱国家”吗？

笔者：您觉得南非是一个弱国家吗？很多人会谈论国家俘获，谈论近年来南非经济持续下滑，国家能力不强，缺乏良好有效的管理组织能力。您认为南非在1994年之后是不是沦为了弱国家？还是说它一直都是一个弱国家？

奥比：我的回答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我很庆幸南非是一个弱国家，因为这有利于开放社会的形成，民主宪政制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们不必

继续生活在一个“监视国家”的恐惧当中。我很高兴我们国家只保留了一个很小规模的军队，它不会取代政权。我很高兴公民得以充分享用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人会被无端指控。同时，我又对一系列现状感到悲观，比如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引导经济朝着健康明确的方向发展，对公共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服务等职能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但是，我宁愿拥有一个弱国家的民主，因为它很开放，人们能够享受自由并且可以带来改变。生活在强国家的人们则经常感到焦虑与害怕，甚至经常遭受权力的支配和霸凌。

笔者：无论选择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像是一把双刃剑。您对南非当下的民主转型总体感觉如何？如果要给南非三十年的民主转型打分，您会打多少分？

奥比：对于摧毁建立在白人至上原则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言，我愿意给出 110 分，它非常重要。今天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我也很高兴他们不知道当初是什么样，他们不用背负如此巨大的痛苦前行。从权利、言论自由、动员、投票、流动、批评等角度，我愿意给出 80 分或 90 分，我们建立了非常开放的社会。从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角度，我也许会给出 30 分或 40 分，即使数百万人的生活已取得很大改善，但是我们提供的改善还是不够，尤其悲伤的是我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好。

前景展望：后种族隔离的“边界”与南非的未来

导语：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年来，既取得举世瞩目的政治成就，也面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挑战。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本部分访谈转向对南非未来的思考和展望。萨克斯以其独特的人生阅历和理论思考，既表达了对南非民主前景的基本乐观，也深入探讨了后种族隔离时代依然存在的各种“边界”问题，为理解转型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一) 南非的未来如何？

笔者：这个问题是关于南非民主转型的前景与展望，您对未来 30 年的南非民主有什么期待和担忧？

奥比：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也是人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你曾经为之奋斗的国家吗？你为之坐牢，为之流亡，为之遭受汽车炸弹并失去手臂的国家吗？看看这个国家如今的样子，不平等、失业、暴力等等，这就是你曾经为之奋斗的国家吗？”我总会给出让人惊讶的回答：“是的，这是我为之奋斗的国家。但是，今天的社会并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我会做一个区分，我们的

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拥有各种传统和各种价值观，人们拥有社会性权利。我理性地相信人们会运用他们的权利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很多年轻人都具有很棒的品质，他们效率很高，价值观端正且开放；他们热爱各种文化事业，唱歌、戏剧、文学……这是一个具有丰富质感的国家。我很高兴我们有很棒的喜剧演员，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喜欢喜剧说明这个社会很健康。我们有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他现在已经是国际明星了。我们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本土喜剧演员。

所以，我基本上对南非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是，我并不指望还能再活30年。我现在能做的只是记录我的记忆和经验，接受你的访谈。我目前正在关注我的小儿子长大，我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我的小儿子将来想成为一名非常成功富有的资本家，当然他有权利这么做。

（二）反思“边界”概念

笔者：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想让您从理论层面谈一谈对“边界”概念的思考。“边界”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我发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依然存在很多隐形的边界。另外也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经历以及目前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冲突，都让我更加反思“边界”概念。我认为边界是由暴力形塑的，当边界与身份绑定在一起，便会催生暴力的身份政治。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我想请您谈一谈暴力、边界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奥比：我感觉它们之间的关系很难回答。它们之间似乎很容易产生直接联系，并且看上去很合理，但是我对此有些许怀疑。我觉得它们之间存在联系，而且很显然身份认同在这个国家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身份认同与经济机会联系非常紧密，经济是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依然存在很严重的空间隔离，这再次强化了这些元素。与此同时，我们又高度相互依存。人们彼此融合，一起共事，你看我们现在的体育队伍，我们彼此互动、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像尼日利亚那样国家分裂，我们基本上不存在那样的斗争。西开普省确实存在一些分离主义的压力，一些人希望西开普省能够脱离南非而独立。^① 这很不幸，但我不认为它会真的发生。所以，我认为南非的社会文化边界依然与族群紧密相

^① 西开普省独立运动是主张西开普省，有时也包括东开普省和北开普省脱离南非独立的政治运动，也称“开普独立运动”（Cape Independence）。该运动于2007年在Facebook上诞生，主要由开普独立党（Cape Independence Party）领导。该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是种族隔离结束后新南非政府继续制定基于种族身份的相关政策不满，以及对经济日益衰退的失望。此外，支持者亦从历史文化角度提出了开普地区的独特性。西开普省是南非唯一黑人人口不占多数的省份，该省近一半人口为有色人。

关，但是它们具有很强的可渗透性。这并不意味着无形的边界对人们没有意义，很多人讨论“白人性”（Whiteness），我想这主要是基于生活经验。很多白人依然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保持优越感。在某些层面，非洲人（黑人）与有色人之间的分裂正在加深，但是在其他层面他们之间的边界则在消失，比如在私人关系、体育运动方面。所以，我会说这是一个多中心的权力游戏。人们有时候非常强烈地拆除边界，有时候却又非常强力地维护边界，没有一个中心会完全主导其他中心。

结语：访谈的价值与缺陷

本文通过对南非重要政治人物的深度访谈，为理解南非民主转型提供了独特而珍贵的视角。作为南非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和民主转型的亲历者，奥比·萨克斯的口述为我们提供了从制度设计者角度观察和评价南非民主转型的第一手资料，有效弥补了现有研究主要依据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不足的问题。

从历史维度看，此次访谈内容跨越了从 1950 年代至今的漫长时期，涵盖了南非民主转型的完整历程。奥比·萨克斯的个人生命史与南非国家转型历史交织融合，真实生动地重现了南非追求民主化道路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特别是他对 1990—1994 年转型关键时期的回忆和阐述，揭示了当时非国大的博弈策略和政治目标，这对理解新南非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维度看，访谈涉及国家俘获、社会失范、族群关系、原住民权利等当代南非面临的核心问题。受访者结合具体案例给出的分析和观点，不仅展现了南非民主转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政治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从理论维度看，访谈触及转型正义、宪政设计、族群政治、国家能力等政治学核心议题，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特别是对“边界”概念的讨论，为理解后殖民社会的身份政治和社会分化提供新的思考框架。

奥比·萨克斯作为与曼德拉、图图齐名的南非传奇人物，其口述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本次访谈正值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周年的重要节点，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现实的反思。受访者对南非民主转型的 110 分评价与对社会发展的 30—40 分评价形成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了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访谈中体现的“从愤怒中看到希望”的态度，以及对南非作为“弱国家”的辩证分析，为理解转型社会的治理困境提供独特视角。这种既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又保持理性乐观的立场，对其他转型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从更深层次来看，萨克斯给出的差异化评分精准地捕捉到南非转型的核心矛

南非民主转型三十年：历史、困境与前景

盾，即政治法律层面的相对成功与社会经济层面的改革滞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层建筑”的快速变革与“经济基础”的缓步前行之间的脱节，是理解南非当前困境的关键。萨克斯本人的思想历程本身就是对这一复杂张力的生动诠释。他的经历与思考说明，一部被誉为典范的宪法可以为社会变革奠定坚实基础，但并不能自动消除深植于历史结构中的不平等，后续的治理能力与政策执行才是将宪法愿景转化为民众福祉的关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单一受访者的视角难免带有主观性，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南非民主转型的复杂图景。受访者作为转型的设计者和既得利益者，其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的“精英偏见”。此外，受时间和条件限制，部分重要问题未能深入展开，一些关键细节有待进一步挖掘和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一是扩大访谈对象范围，包括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群背景的关键人物；二是深化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具体博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机制等；三是加强比较研究，将南非经验与其他转型国家进行对比分析。

(责任编辑：贺杨)

structured interview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ir decision to study in China is primarily driven by material needs, including affordable costs, scholarship support, a safe environment, streamline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fter arrival, their focus shifts towards satisfying higher – level psychosocial needs such as belonging, self – esteem, and self – actualization, while fac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cultural barriers, social isolation, social biases, disparities in academic support, and degree recognition.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hough physiological and safety needs are generally met, satisfaction of psychosocial needs directly shapes the emotional tone of the “China’s story” narrative of Afric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University rankings,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gree recogni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fulfillment of 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 To this end,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ing the experience of Afric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y enhancing scholarship systems, building platforms for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boosting degree recognition,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active ambassadors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s study provides micro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words: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Cross – Cultural adap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uthor: Li Mingru, Postdoctoral Fellow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Thirty Year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History, Dilemmas and Prospects

——Interview with Justice Albie Sachs, Architect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

Albie Sachs and Zhu Pengfei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rough an in – depth interview with Albie Sachs, the former Justice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Court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 Drawing on his dual perspective as both an institutional architect and key participant, this study examines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contemporary dilemmas of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interview covers Sachs’ revolutionary

engagement, the constitution – draft process during the cr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of South Africa from 1990 to 1994, the rol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as well as core issues facing South Africa such as state capture, social anomie, ethnic group conflicts, and indigenous rights. Sachs offers a differentiated assessment of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scores 110/100, rights protection rates 80–90/100, yet quality – of – life improvement registers only 30–40/100, reveal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socio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s invaluable oral history, this interview not only provides a rare “insider perspective” for South African studies to address research gaps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but also supplies essential empirical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issues such as transitional politics and postcolonial governance. Its insights offer critical guidance for other transitional countries.

Keywor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of South Africa, transitional justice, state capture, identity politics

Authors: Albie Sachs, the former Justice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Court,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outh Africa; Zhu Pengfei, Lecturer of the Institute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th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